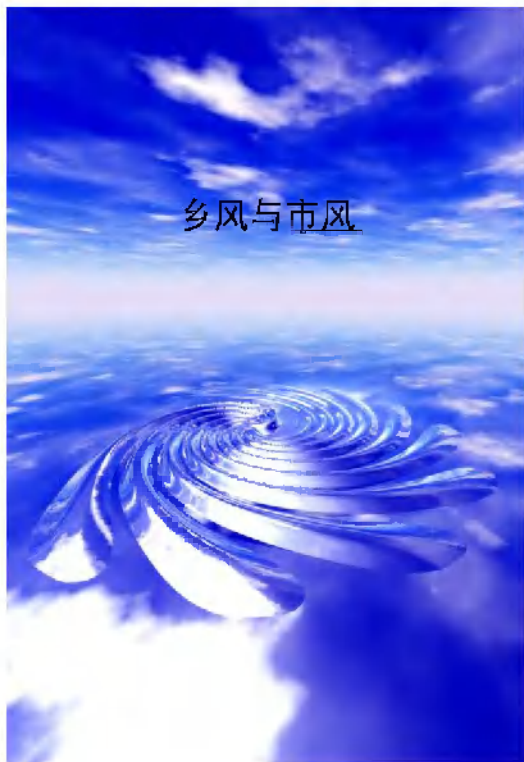


乡风与市风





碑林

乡风与市风 灵山歌

雪峰 著



A09389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风与市风 灵山歌 / 冯雪峰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3069-6

I. ①乡…②灵… II. 冯…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463 号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14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7.50 元

乡风与市风

序

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

——庄子

我编好去年所写的杂文成一个小集子的时候，这一句话又被我记了起来了，这或可证明它为我所爱，但最主要的怕还是因为和我的一个已经死了的朋友有关系。这已经是前年十一月间的事了，我拖着病的身体，从F省到浙南，想每日走三四十里，奔向到已经沦陷了将近一年的家乡，去寻觅我打听不到消息的妻子和小孩，但将近家乡的接境处，情况却非常混乱，路也不通，我只得折了回来，在丽水住下了。于是感到了无法可想似的忧愁，每日睡在床上，仿佛病也厉害起来似的。但住在邻近，而且每日过来谈天的一个朋友，金瑞本先生，却在那收复后不久的丽水，几乎以一人之力在恢复一个报纸。而且他是患着真真沉重的多年的肺结核的，又很穷，报馆也无钱，人手更不多；报出版后，他就非一个人兼做四五个人的事不可。至少因为他是总编辑，有时一大张报非由他一人编辑不成。这样，病自然是更厉害起来了，而他的矛盾也就分明地显露了出来，时常在谈话的时候，一边咳嗽着，红着颊，喘着气，流露着种种深积着的牢骚，而一边却计划着即刻恢复副刊，训练编辑人材，在沦陷区建立通信网，等等，想使他的报成为能够反映东南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动向的

报纸。一边明明知道言论之路怎样的狭窄，而对于一往直下的时势，言论之效又是怎样的微小，但一边却偏与当时当地的披靡的风气奋斗，与走私、投机、囤积等奋斗不用说了，还与公然的贪污腐化奋斗，与做旧戏抽赌捐至数月之久的现象奋斗，与对下属逼奸不成即假以罪名将她置于监狱、或送上峰礼物至于十多担的县长们奋斗，而同时是欲将社会的真相，人民的疾苦，和民众的真实的战斗宣布了出来。但这些却是最煞风景的事，不但听到了各方而来的威胁的风声，而且同人中也有以为这样认真是犯不着的论调；他于是一方面而将威胁的风声之类看作他的工作有了效果而得意着，一方面又沉重地感到黑暗势力的雄厚及和他同样认真的帮手的缺乏。这后一种的感情对他非常有害，他常常表露颓丧了，而最坏的是在这种时候他分明地意识到自己病的沉重了。有一天，他睡下了，那时由他自己兼编的副刊，便要我代看一些来稿，并每天凑写一篇短评式的东西，即以谈话时我曾引用过的庄子的这一句话为理由，还说这是能够使两人的病都会很快好起来的。果然，我只代他看了近十天的稿，写了十余篇短评，他立即送来了一个条子，说已经起床，而且副刊已经请到了专人，可以不再劳我了。……

就是这一点事情，我记了起来的。

但我现在记了起来，且在此记下这一段事，第一是我想藉此再回忆一下这一个死于自己工作里的朋友。我在去年三月间离开丽水，到不远的小顺去住了一个多月，在一个多月中间就接到了他三四封信，依然是一边壮勇，一边凄苦；壮勇的是报告我写了什么社论，终于将什么不可侵犯的人物也触犯了他一下之类，凄苦的是寂寞，说不但缺少对手，而且人生的什么幸福都被剥夺去的时候，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可以谈谈天的

朋友，但连这一个也没有。有一次我接到别人一封信，说很多人以为东南所有各报是他编的这一报最强，我马上将这话写信报告给他了，他回信说，这消息对于他是很有用，因为周围对他是取敌视的态度，而这证明血总还不是完全的白费。但在五月初我在动身来渝的前两天，特别跑回丽水去告别的时候，他却已经卧下，报纸每夜的清样都须送到他的床上来看了。我到渝后曾接到过几封信，他的病，中间曾经好过几个月，能够像平日一样地劳作，但十月间重又卧倒，还曾来了一信，说现在倒可以清闲地静睡，想想许多问题。可是大概我的回信他都没有收到，就于今年元旦后数日忽然接到那报馆里打给我的电报，报告他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逝世了。但我至今没有一点表示，也不能对他的家属有所帮助，除了我自己一个人感到有痛痒之关的一点回忆。

第二，于是，我想记下几年来常感到的一点感想。上面所引的庄子的文句，那接下去是说：“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的本意原是在这里，但我一向不喜欢这一种态度，以为离那逍遥游的时候还早得很，何况这所说的江湖更是超现实的，他是在叫我们脱离现世。但我又想，我们固然不要那超现实的江湖，以及在那里去相忘，而我们却有现实的战斗的江湖，甚至汪洋大海的，真实的战斗者就须在那里去相忘，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能旺发和广阔。庄子的超现世主义的话，我们用到现实的战斗的精神上去，正可以使我们除去许多的鄙细与吝嗇。可是，路程实在是艰难曲折，而现实的工作和战斗也实在是繁重和残酷，不独是在一场大水之后曾有很多会留在干涸的地方，即在同队行进的时候也仍要有彼此失顾的事；因此，除了忽然逍遥到庄子的江湖里去了之外，留下的这些人们便不能不个别地更艰苦地挣扎，不能不时时感到如在涸辙

之上，而相濡相煦之事这才能够成立，而且是可贵了。但是，这虽有些可怜相，却仍是战斗、而且是非有不可的战斗；这在个人方面是即使溷死了也应该看作份内之事的，但在有关系的战友便不可不理解，尤其在现在这样的时候。其实，这样地散落于各地在战斗着的人们真不知有多少，而历史的一小部份是由他们在推移着的。因此，我以为相忘于战斗的江湖固然应该是战斗者的本色，但相濡相煦，尤其在困难的时候，也是不可排弃的。自然，对于个人，在中国古哲的言语中，我是更爱如陶潜的

精卫衔微木，
将以填沧海

之类的诗句。这是即使一个人，做着极微小的事，也如在转移着乾坤似的气概。

第三，也藉此说明这一点点杂文就是这样地开始写的，那时确想帮他一点忙，除了已写出即在那里发表的十馀篇外，当时还定了很多的题目，预备他缺稿时即可以应急，但一则投稿的人尚多，二则他完全爱惜我，以为我应该将时间用到睡觉和散步上，可以使我的身体早日恢复。我现在想起来实在很惭愧，到重庆后所写的二十馀篇的短文，有一半以上是那时所定的题目，但懒惰和别的原因，不但没有写别的什么，连那预定的题目都还有很多没有写，也没有做文字以外的什么事。不但惭愧，并且也遮不住我的荒芜；现在就只是怀念起金瑞本先生，写下了这几句话。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

还好主义

像下面这类现象是现在中国到处可以看见的罢，例如敌寇来了，看见房屋就烧，看见人就杀，看见女子就强奸，看见东西就抢，但那时候倘若东西全被抢了，房屋也烧了，而人还能够逃得一条命，那么人就说：“总还算好！”倘若房屋烧了，但还留下了半间，东西被抢，但还留下了几件，那时候就更要说：“总还算好！”甚至于人被杀了，但只杀伤不死，被强奸了，但没有在强奸后被杀，那时候人也还是说：“总还算好！”这是多么现实的精神呵。

所以，例如整个村庄都被烧光了，敌寇一退，不到十天，在那焦土上已经搭成了草棚，人已经在那里生活着，虽不能说是“喜气融融”，但也仿佛颇有生气的生活。衣服被剥了，身上挂着一件小衫在严寒里战栗着，但能够如此生存，仿佛也是得天之赐。这又是何等英勇的伟大的精神呵！

这种精神，我们到处存在着；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普遍。这种精神一方面是现实的，而且战斗的，这是人类所具有的生活战斗上的伟大精神。它不仅表现了人类之原始性的生活力，而且也正是久经战斗的民族所积蓄成的一种富于韧性的战斗力！没有这种韧性的生活力和战斗力的民族，它就不能战斗，并亦不能生存。

只是与这同在的还有另一方面，另一种精神，那就是奴性的卑贱的苟安，一种低级生活的满足。这是久经战斗而又久

被摧残的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一种精神上的宝物。我们的民族是久经战斗的也是久经压迫摧残的民族；历代反抗过来，却也久已过惯了奴隶的低级生活了。于是，一遭到苦难灾害，就不仅显出了韧性的伟大的生活战斗力，而且这一种奴性的低贱生活的自满——这一种祖传的精神宝物，也就即刻来填满浩劫之后的空虚了！

不用说，即使怎样的低贱，生存总是首先必需的。——难道房屋被烧了，就不搭草棚，衣物被劫，就自杀了不活么？而且相当的忍痛和耐性，在战斗上也是必需的，——难道一被抢劫奸杀，只一味的痛哭流涕，咒天骂地就算完事？然而这一个“总还算好”却是冲淡了多少仇恨心，减少了多少战斗的热力，麻痺了多少的力求上进的意志呵！

这里诚然就有着一种自信力。然而又有多少的消极的侥幸心理呢。

试看，当敌寇肆行奸淫烧杀的当时，那是无人不切齿痛恨，而且也实施搏斗的，但敌寇一退，或者驻下“安民”，许你搭草棚的时候，不就是大半相率共庆馀生，但求敌人能稍为慈悲一点就好的么？甚至住了草棚，也仿佛生存于太平世界一般，于是忍受了最低生活之后还有最低生活，那忍受就真未可限量。这正是现在许多最普遍的现象中的一种。

民族的根深蒂固的伟大战斗力，黏附着同样根深蒂固的不长进的根性，这种根性如果配合着强压与奴化兼施的如敌伪的政策，那么这就要成为所谓“亡国灭族”的必然性之一了罢。但这里也就有着政治的和文化的战斗任务。

论女人的“虚荣心”

所谓“虚荣心”，历来便被看作女人的一种“天性”似的东西，但这一种“天性”，不但在人类离开动物的地位的时候没有，即在女人当作完全的奴隶的时候也还没有的。只是，即使在男女共同用两手劳动的时候，除了“母性”之外，女人还没有其他的怎样特殊的“天性”，但在成为完全的奴隶，或者说，成为道地的占有物的时候，女人于是就有“奴隶的嫉妬心”，则在从占有物升为买卖物，也就是从奴隶降为半奴隶的时候，女人便不能不有“竞争心”了。然而要从这个“竞争心”发展成为所谓“虚荣心”，还须在女人不仅是奴隶，而且是玩具，而且是完全的消费者的条件之下才行；就是说，必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即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发展到不但直接生产者陷于广泛的悲惨辛苦的状况，并且消费者也已扩展为广泛的阶层，社会上不仅以奢侈和消费为幸福，而且还有使人徒用智巧也可获得这样的地位的可能和机会，——在这样的社会，“虚荣心”这才和商人的“投机心”，市侩的“势利热”，士子的“趋炎”、“投靠”和“升官发财欲”等等一起，成为女人的“天性”似的东西了。在这样的社会，女人的阶级身份便因买主和属主而定，所以她虽然并没有选择属主的自由，却非有患得患失的恐惧不可；女人命运的荣辱和生活的劳逸，也因属主身份的高下而定，所以她虽然没有自拔于深重劫运的社会可能，却必须要有获得安逸和奢侈的消费者生活的幻想和努力。加以在这种情

势下，女人又不得不成为除了天生的生殖本能和作为性的玩具的条件之外，她就没有更适用的和重要的战斗武器了。这样，她又怎能不“天性”的地群趋于“虚荣”？而“虚荣心”又怎能不以提拔自己的地位为动机，以衣饰的阔绰和一切增加性的刺激力的方法手段之获得为现实的目标，以对于安逸的奢侈的消费生活的希望为根本的精神呢？

然而，因此，这本身便是一种矛盾。这不仅由社会的矛盾所产生，这尤其反映着女人与社会的不能因此而解决的矛盾。说女人历来就“自失”于“虚荣心”，说她们秉有这一种“社会的天性”至今也还未能脱出，那不过是说女人在“自失”之前，一向便是“被失”，至今也仍是卑贱，并没有获得“荣幸”，即使走了“红运”也依然是“空虚”，而奢侈之下是加倍的贫乏罢了。在这意义上，实在是无所谓“自失”，但同时女人的自觉却开始了。

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和社会的矛盾，是由于她们在社会上失去了经济的地位；而她们那么战战兢兢地想“抬高自己”，那么“天性”的地趋向于“虚荣”，那么“性爱奢华”和容易“堕落”，这也证明她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同时更证明跟着“虚荣心”的增加，危惧和失望也愈大，愈快了。即从“虚荣心”的露骨的现象，也不仅使我们明白这现象必然在消费阶级的妇女为最烈，而且还说明女人在社会的生活中，受着更为赤裸裸的经济的威迫，尤其在“虚荣心”受到打击，和自觉到自己失去生产的能力，却不能不以性的条件维持着自己的地位而感到空虚时为最甚。这种威迫，和这种打击及空虚，是时时在受着，感着的。自然，这还不是自觉，但这是和“虚荣心”同时产生的女人自觉的可能条件。同时，女人的真实的自觉，就在直接生产者在经济战线上的战斗对于社会发生分明的影响的时候，

作为一种有力的反映，首先在中下阶级的妇女中表现出来了。于是“虚荣心”这才显出了它的丑态。而它所反映的社会的矛盾也更分明起来了。

不用说，“虚荣心”就在上层消费社会也被当作女人的弱点而被轻视着，作为轻视女性的一个道德上的根据的；同时又将这弱点利用着，奖励着，作为玩弄和控制女性的一种方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生产者大众觉醒的面前，女人有了真实的自觉的时候，在消费者阶级里，“虚荣心”就不仅更和这社会层的腐烂的生活意识联结得更紧，作为这社会层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之一而存留，而且还跟着这社会层的破裂的加深和妇女地位的更恶化，它又发展得更露骨和极端。只有真实觉醒了

的妇女，和一向没有脱离劳动而“虚荣心”的发展也被限制着的妇女，才能跟着自己解放的途径和可能日益显得分明和有把握起来的时候，逐渐清算着这种“社会的天性”了。同时代之而起的真实的战斗心，即“进取心”，“向上心”，也就兴旺起来。自然，即在战斗的新的女子，尤其所谓“小资产者倾向”的新的女子，“虚荣心”也还常在猛烈地阻碍着她们的前进，常常要使她们“倒退”，“没落”；尤其在半途遇见挫折而感到失败和绝望的时候，这“虚荣心”所含的安逸和令人往下堕落的毒素，就最容易轻松地侵蚀着她们，使她们忽然自暴自弃，结果是“堕落”起来，这是屡见不鲜的。但对于这种问题的认识，和对于这种弱点的克服，是只有从生活环境和思想上去分析，作为社会传统意识的要素去清算，才有意义和效果；这不能看作女性的先天的弱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虚荣心”也是旧社会用来陷害战斗的女性的最毒的阴谋之一。

妇女“觉醒”的今昔

在以前和今天的社会，妇女是家庭的和**社会的奴隶**。但在中上层的消费者的社会，既以消费为特征，则妇女作为性的玩具的意义就不能不特别的重要和露骨；而在下层的生产者的劳苦社会，她们又不能不同时是社会的生产的奴隶，家庭的奴隶，和后代奴隶的繁殖者。……

因此，二十多年的“妇女觉醒”的潮流，也就主要地从两个社会根源发生、汇合而成。但是，如果在当初中上层社会的一部份妇女争得了进学校，受那“总算比较新式”的教育的机会，是由于西洋欧美式的民主思想的冲击，那么，这是封建社会的崩溃的象征，同时也决不违背所谓“新式人士”的自私目的，因为造成更为适用的贤妻良母，客厅里的“风趣”，更不蠢笨的膝头上的玩物，也未尝不好。但这里就产生了“觉醒”的智识妇女，和中上层社会的“妇女觉醒”运动。那运动的主题又正是反抗封建宗法社会的礼教，恋爱与结婚的自决与自由，以及反对新式的玩具制度的“娜拉”运动。这运动为革命思想运动所支持，并为思想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实践着全社会的妇女觉醒运动的历史任务。这运动，在其历史的任务、性质和可能上，是不能不由智识妇女开始，并由她们所代表，而她们的激烈的战斗性，便由她们的“觉醒”恰正吻合着民族革命的历史客观任务的这一个契机所赋予。

然而中国下层社会的广泛妇女，却一向以来并没有得到

一种恩惠，就是：和她们的兄弟丈夫一起，作为生产的奴隶，为了能够使用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得好一点，而得到受一点“最低级的”教育的机会。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的新的生产工具好给生产者使用，而向来好的物品又有外国人来供给，“新式人士”不能不在贩卖外国货和“帮忙外国人”上面去赚钱。但她们不能不参与她们的兄弟丈夫们的抵抗冻饿的斗争，那斗争又是那样的猛烈，内容广泛，即刻成为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的最真实和最主要的战斗。

可是，这战斗如果意味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封建势力的依然顽强，并且意味着中上层社会的反封建者层的无力与妥协，那么，反映于智识妇女的“觉醒”者层中的情形，便不能不和全体智识份子层中所反映的一样，即不能不使“觉醒”者的苦闷、徬徨、及倒退、没落和前进了。而她们的苦闷、徬徨，还实在代表了整个中上层社会妇女的苦闷和徬徨，因为她们依然是玩具、奴隶，而不做奴隶和玩具的路，又简直是没有；倘若有，却是那样的难走，过于违背她们的寄生虫阶层的本性。这时候，在“觉醒”的和好像“觉醒”的中上层社会妇女的面前，“经济”两个字便不能不特别地明白和可怕，并且也可贵了起来。这一方面是证明中上层妇女的“觉醒”的诚意及其实践的趋向——有些“娜拉”的确是“出走”了过的，——终于触到了这根本的问题；另一方面却使她们恰恰“觉醒”了自己的阶层意识了。这样，对于自己的经济地位的认识，如果是她们的倒退和前进的分歧的根本出发点，那么这不仅是她们的怯弱和勇敢的试金石，而且也正说明她们对于生活的观念和社会的思想是有着分歧的罢。这样，如果那真真“觉醒”的，勇敢的，由于真真想解放自己，因而认清了社会的“真相”的份子是毅然地前进了，那么这便说明着前进者是和反对吃人的礼教

和买卖婚姻的同时，也憎恶着消费阶层的腐烂生活，并且不能不进而从事解放全民族和全人类的战斗了。而同时，如果那时有些已经“觉醒的贵家小姐”，不能不回到“爸爸那里”去，终于“忧郁而死”，或甚至有“到尼姑庵里去的”，这就不能不说是她们的牺牲，也说明了她们的怯弱。同时，有些贵家小姐忽然“觉今是而昨非”地回到爸爸那里去，“那么热烈地去办她的嫁妆”，也不能不说是她们是以收租收利息的生活为必要了。因此，我们很难同意说所有重新回到丈夫的“厨房”、“客厅”、和“被窝”里去的“娜拉”，都是那么“抑郁不乐”的；看罢，她们中就正有比以前还更觉得那“小菜的甘美”，“客厅的光荣”，和“被窝的温暖”的“娜拉”在。我们同样不能同意说那些苦闷、矛盾、失败、而且破灭得那么悲惨的“既不甘落后，又不能前进”的“密斯”们，那些没有“回到爸爸那里”去，但也没有向前走一步的贵家小姐，那些“忽然眼高起来”的“小家碧玉”，那些那么“要求着任性的生活”，而又“渴望着光明”的中等社会的“新的女性”们，还有那些赤了屁股跳到宴会桌子上去跳舞，说是“颓废”的“颓废者”们，那些一边倒在“老头子的怀里”，一边追逐着“意中人”，或者前妻的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说是在经历着“黑暗与光明的矛盾”的“悲剧角色”们，以及一切为我们的艺术家所喜欢描写的所谓“富有矛盾性和悲剧性”的女主角们，——说她们的破灭，只是对于社会的战斗的失败，而并不含有被她们自己的腐烂生活的理想和意识所毁灭的意义。……

总之，她们的分歧的意义是很明白的。

但是，如果这是明白的，则现在的情形便当然更明白。

现在的情形是：在中上层社会，少数的“正派”的太太以至先生们，的确“苦口婆心”地在提倡着“母教”，“节约”，以及别